

诸葛亮南征问题讨论

梅铮铮

【摘要】 诸葛亮南征故事因小说传播而为大众耳熟能详,但是史书记载却极为简略。三国时期南中地区因秦汉以来大量移民,形成的汉人大姓豪族集团和当地民族间的矛盾,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对立战争也时常发生。当刘备去世后,爆发了汉人官吏联合大姓豪族和夷人首领反抗蜀汉朝廷的叛乱。诸葛亮励精图治,经过三年充分准备于建兴三年春亲率大军南征,在不到半年时间一举平定叛乱,取得获得政治、军事双丰收,南征之役也成为诸葛亮一生中辉煌功绩之一。

【关键词】 诸葛亮;夷人;南征

【中图分类号】 K23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3)05-0082-6

诸葛亮南征平叛,被历代史家看作是他一生中辉煌的功绩之一。尤其是经过小说的演绎之后,南征故事更加成型。《三国演义》从第八十七回到第九十一回整整用了五个回目加以描述,其中的火烧藤甲军、七擒七纵孟获等情节早已为众人耳熟能详,这些故事构成了诸葛亮军事智慧的典范在民众中广为流传。然而对于这段历史,正史《三国志》记载却极为简略,《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建兴元年……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

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卷七《刘后主志》记载稍详:“建兴元年……南中诸郡并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未便加兵……三年春……三月,亮南征四郡,以弘农太守杨仪为参军从行,步兵校尉襄阳向朗为长史,统留府事。秋,南中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

从上述史料中不难看出,对于蜀汉朝廷如此兴师动众的军事行动,在史学家眼中仅仅寥寥数语,或“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或“亮率众南

征,其秋悉平。”没有成为瞩目的重大军事事件,而脍炙人口的“七纵七擒孟获”、“火烧藤甲军”之类更是未见载其中。看来历史和文学、史实与传说之间除了联系仍有许多疑问。2011年春秋两季,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与凉山州博物馆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考察三国时期南中部分地区的诸葛亮南征遗迹,调研了当地相关传说等诸多问题。本文就其中二个问题讨论如下:

一、蜀汉时期南中叛乱的原因及性质

据上引史书记载,南中地区正式发生叛乱的时间是在蜀汉建兴元年。其实,早在此之前,南中地区已经出现叛乱的迹象。“建安末年……夔又诱导益州豪姓雍闿等,率郡人民使遥东附,权益嘉之。”^{〔1〕}

《三国志·蜀书·张裔传》也有记载:“先是,益州郡杀太守正昂,耆率雍闿恩信著于南土,使命周旋,远通孙权。乃以裔为益州太守,径往至郡。闿遂赳赳不宾,假鬼教曰:‘张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不足杀,令缚与吴。’于是遂送裔于权。”益州叛乱者杀了太守正昂,作为南中大姓豪族人物雍闿

〔作者简介〕 梅铮铮,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00。

不仅没有制止这种叛逆行为,反而利用自己在当地的威信,勾结远在长江下游的东吴政权,接受其奖励,率全郡人民归附孙权,甚至还将朝廷派来的新太守张裔流放到东吴。种种迹象表明,雍闾不服蜀汉朝廷统治叛乱之心昭然若揭,南中地区大规模动乱随时可能发生。接着“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嵩,雍闾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牁。”^[2]“雍闾等闻先主薨于永安,骄黠滋甚”^[3]。另据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载曰:“初,益州从事常房行部,闻褒将有异志,收其主簿案问,杀之。褒怒,攻杀房,诬以谋反。诸葛亮诛房诸子,徙其四弟于越嵩,欲以安之。褒犹不悛改,遂以郡叛应雍闾。”由此看出,南中地区的不安定不仅是刘备死后才发生,而是刘备再世时就初露端倪了,只不过明目张胆大规模军事叛乱是在先主去世后。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军事叛乱?检阅史书发现,南中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并非一日、一时存在,而是由来已久,原因之一就是民族关系复杂。三国时期的南中在汉代称西南夷,自古分布着夜郎、滇、邛都三个较大的部落,及嵩、昆明、冉駹、白马等民族部落。早在战国时期,楚威王派将军庄蹻攻略西南。庄蹻到了滇以后,因“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4],于是庄蹻称王于滇。为了更好统治,他甚至“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到秦时,朝廷加强了边远地区的统治,派官员“常頡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5]同时还将关中豪族迁往西南夷,如吕不韦子弟宗族被强迁至此,这给杂居着各种民族的偏远地区增加了外来势力,使得本来复杂的民族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而难以管理。《史记·西南夷》中记载:“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说明虽然朝廷对此地的控制有所减弱,但是夷汉民间贸易往来却异常繁荣,反而促进了巴蜀的殷富。然贸易的繁荣并不能掩盖当地夷人统治者与汉人与朝廷的矛盾,以至于滇王会对朝廷使者发问:“汉孰与我大?”《史记·西南夷》中记载的“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笮侯”,也只是几次边夷与朝廷间矛盾的局部冲突,并没有爆发中央与边

地的全面争战,但是,西南诸郡反抗朝廷的叛乱从未停止,这种争战延续久远。

统治者对这样叛乱历来采用严厉镇压,比如安帝元初四年永昌、益州、蜀郡发生叛乱后,朝廷“诏益州刺史张乔选堪能从事讨之。乔乃遣从事杨竦将兵至牂牁击之,贼盛未敢进,先以诏书告示三郡,密征求武士,重其购赏。乃进军与封离等战,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获生口千五百人资财四千万,悉以赏军士。”^[6]本来西南地区就是民族杂居,“俗多游荡,而喜讴歌,”而且“豪帅放纵,难得而制”。再加之朝廷过重的剥削,横征赋税,汉人对少数民族的不尊重,官吏的欺诈、压迫,更激化原本就突出的矛盾,所以少数民族动乱的时常发生就成为必然。

然而我们分析发现,发生在蜀汉时期的南中叛乱,却与两汉时期的少数民族动乱性质不同。从前引《三国志·蜀书·李恢传》和《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中记载可看出,刘备去世后,越嵩郡的高定行为开始放纵不羁,建宁郡的雍闾亦飞扬跋扈,朱褒则直接在牂牁拥郡造反。表面看来是夷人首领高定为此叛乱的始作俑者,接着雍闾跃跃欲试,朱褒在他们影响之下响应造反。《华阳国志·南中志》也是这样记载说:“先主薨后,越嵩叟帅高定元杀郡将焦璜,举郡称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闾亦杀太守正昂”。反映出高定元杀郡将焦璜之后,紧接着发生益州大姓雍闾亦杀太守正昂,再接着是朝廷更选派张裔为太守到益州,结果被雍闾流放到东吴的事件。然详考史料发现《华阳国志》在记载这件事上与史实是有出入的。《三国志·蜀书·张裔传》明确记载:“初,越嵩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上县,去郡八百余里,其郡徒有名而已。”说明诸葛亮讨伐高定(《华阳国志》记为高定元)在先,而太守龚禄、焦璜被杀事件发生于后,以至于以后继者都不敢到越嵩就任,只能在距离八百余里的安上遥控。《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记载明确:“建兴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拥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闾反,流太守张裔于吴,据郡不宾,越嵩夷王高定

亦背叛。”事实非常清楚，在刘备去世后，正式打出向蜀汉朝廷造反大旗的是牂牁太守朱褒，这是蜀汉集团内部公开叛乱的太守级别的高官，他率领全郡反对蜀汉政权时间是建兴元年夏。在此之前发生的益州郡大姓雍闿反，流太守张裔于吴并非真正公然举兵对抗朝廷。所谓“大姓雍闿反”，属于地方豪强势力和朝廷作对，并不能代表蜀汉官僚集团内部在南中地区分裂势力。虽然雍闿动乱最早，但是还未真正对朝廷构成威胁，反映在具体问题上叫做行为诡异，“据郡不宾”。之前，益州曾发生郡民造反者杀太守正昂这件事，我们不知道正昂因何故见杀，从《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记载来看时间是在建安末，而这时刘备还在。从事件本身也看不出雍闿是否是杀太守的主谋，但后来《华阳国志》却将此次谋杀的罪恶记在他的头上。不论事实真相如何都可以肯定，雍闿不是这件事知情者也是默许人，作为当地汉人大姓雍闿脱不了干系。所以南中地区反抗蜀汉朝廷萌动于雍闿，而朱褒的反叛才代表了南中诸郡正式公开举起向蜀汉朝廷抗衡的旗帜。

雍为南中大姓，其他如焦、娄、孟、爨、毛、李等大姓，均为庄躄称王于滇后几百年间迁居南中的。由于地域和环境的影响，其中一些大姓可能有若庄躄一样改变服饰，在相当程度上融合当地习俗成为夷民化的汉族豪强地主，如雍闿之流。当然，也有始终保持汉人本色的如吕氏宗族的后人吕凯。吕凯是忠于蜀汉朝廷的边官，在雍闿数次来信劝其跟他一到谋反时被他拒绝。还在奉劝雍闿的书信中说：“伏惟将军世受汉恩，以为当躬聚党众，率先启行，上以报国家，下不负先人，书功竹帛，遗名千载。”其用“世受汉恩”、“下不负先人”使用这种词汇是希望用同为汉人渊源动之以情，并直接指出其“先人”什方侯雍齿从西汉高祖时代起世代代受大汉王朝恩惠，身为汉人血统的豪强首领雍闿不应该辜负朝廷。雍闿本人因长期生活在南中地区，“恩信著于南土”^[7]，表明他在本地享有极高的威信。史书称“（刘）璋卒，南中豪率雍闿据益郡反，附于吴”^[8]，说明他有反叛的劣迹。从雍闿先祖迁

居于此生活，经过数代经营拥有“恩信著于南土”的声望和地位造成个人野心膨胀，内心始终摆不正与朝廷的关系，抗拒朝廷的念头由来已久，希望通过一些事件来达到和满足他更高的欲望。正昂被杀头或许认为朝廷理应将他提拔为太守，从他汉人血统和在当地的威望，他都认为太守之职非他莫属，却未料朝廷将已经上任的巴郡太守、司金中郎将张裔派往益州做太守。张裔本为刘璋旧部，应该熟知益州全郡的情况，刘备正是基于此才将其从巴郡调往南中。当时，刘备正与东吴相恃于夷陵，为安定南方张疑体恤朝廷的用意，“径往至郡”。张裔的上任当然打破了雍闿的升官梦，这是他决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可以对杀正昂不置一词，但不能容忍新官上任。不过此时他还不愿与蜀汉朝廷撕破脸，故假鬼教流放张裔于东吴向其示好。早先在刘璋死后，他就曾投降过孙吴，所以这次故伎重演，希望得到东吴方面的支持。果然孙权及时回应，“遥用闿为永昌太守”^[9]。刘备兵败夷陵病逝永安，雍闿的表现“骄黠滋甚”，反叛之心加剧。李严写一封长达六页的书信晓以利害时，他的回信内容依然是态度傲慢无理。据《三国志·后主传》载：“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闿反，流太守张裔于吴，据郡不宾，越嵩夷王高定亦背叛。”将雍闿流放张裔时间和后来他真正造反混为一谈，实际上雍闿的反更突出是表现在对朝廷的态度和言语上，规模不大影响较小，更没有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朝廷不能触及其根基。故朝廷一直施以怀柔羁縻政策，视其为地方大姓个人行为。而到建兴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反叛，这时地方政府公开与朝廷对抗，加之先前雍闿作乱，正规军和地方大姓联合一起造反，真正威胁到了朝廷后方的安危，这才促使朝廷迫不得已让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任乃强先生说：“朱褒，朱提人，为牂牁郡丞，领太守，则亦南中之士流，才力能胜太守。以不实授太守为怨，与雍闿同。”^[10]所以雍闿对朝廷不恭敬，触发了朱褒的神经，他迎合了雍闿的动乱意愿并动用军队公开造反。这时，发动叛乱的还只是汉人大姓和同为汉人的牂牁郡太守，尚未得到夷人认同，故出现了“益

州夷复不从阉”的现象^[11]。这才有后来雍阉让建宁孟获煽动夷叟共同造反的欺骗语。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三国时期南中地区即两汉时期的西南夷,因为历史原因,其不安定因素由来已久。当地各个民族杂居、夷汉关系复杂。更重要的其地理位置偏离以成都为中心的统治,朝廷派出的官员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而民族首领、汉族大姓豪族们对朝廷繁杂赋税内心充满怨恨,也不排除因官员欺诈、剥削激发民愤,各类矛盾相互交织之下,是以南中地区始终存在叛乱危机。当中央政府强盛时期,这里不论汉人还是夷人,都能遵守统治秩序。一旦朝廷控制能力衰微或有动荡事件发生,南中就有形成割据、叛乱或投靠外人的大事发生。此次蜀汉建兴元年夏季的这次叛乱的诱因,就是刘备东征失利病逝于永安,朝廷无暇或难以指派有能力者到南中,引发了汉人大姓长期桀骜不驯于朝廷的因素。于是汉人官吏主动迎合反叛,夷人首领响应的大规模叛乱成为必然。刘备去世后,越嶲夷王高定仅是行为方面不服朝廷,为所欲为,尚未公开与朝廷为敌(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其后发生的)。高定是看到雍阉行为不轨,将朝廷指派的张裔流放到东吴后,加之以牂牁太守朱褒起兵造反,才同流合污参与背叛的。具体是由益州大姓雍阉率先发难,接着牂牁太守朱褒相应公开动用正规军造反,紧接着诱惑越嶲夷王高定参与共同造反。是以此次叛乱可定性为汉人官吏造反于先,夷人头目跟进于后的一次反抗蜀汉朝廷的军事叛乱。

二、诸葛亮南征时机的选择

蜀汉建兴元年夏,刘备病逝永安宫,南中地区原本不稳定的因素受到刺激,很短时间内就发生汉人大姓和官员带头,夷人首领参与的大规模反抗朝廷的叛乱。作为朝廷丞相的诸葛亮是怎样应对的呢?史书记载只一句话:“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12]。直到建兴三年,诸葛亮方才挥师南中,“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建兴)三年春三月,丞

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从南征战事进程来看,诸葛亮春三月出兵,到秋季就平定叛乱,南征进行得可谓十分顺利。问题是,从叛乱开始到诸葛亮出兵,其时间间隔长达三年之久。按理来说,南中的军事叛乱其矛头直指蜀汉朝廷,是一次大姓豪族和官员为首,夷人首领紧跟的旨在推翻蜀汉政权的叛乱。这不仅仅是几个郡、几个官员的反叛,几乎是整个南中地区也就是蜀汉朝廷后方,其性质十分恶劣。叛军首领如雍阉之流,已经直接接受东吴遥封的永昌太守。因此,叛乱不仅发生于蜀汉内部,而且得到东吴方面的支持,如果不能很快平息叛乱,那么蜀汉政权都会因此而动荡不安,这对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己任的诸葛亮是决不能容忍的。问题是诸葛亮为何要到建兴三年及叛乱发生三年之后才南征呢?是什么原因让具有聪明才智的诸葛亮等待三年?三年中他又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考史书,我们发现诸葛亮的等待是迫不得已的。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兵力不够多。上引史书说诸葛亮因“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表面看来是因刘备去世举国哀痛之故而不方便出兵,其真实的情况是蜀汉难以再聚集足够精兵南征。

章武元年秋七月,刘备出兵东征,到第二年兵败夷陵,大伤蜀汉元气。刘备此次兵败到底损失了多少兵士?史无明载。那么我们首先应弄清楚刘备大概带走了多少兵。刘备刚到益州,刘璋增兵与他进攻汉中张鲁。史书载:“先主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13]以后二刘反目,刘备围攻成都,史书记载刘璋“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14]。刘璋投降后,这三万人应当被刘备收编,加上刘备自身的军队合计蜀汉建立时军队人数接近六万,能随时调动的精锐部队人数也在五万左右,这是蜀汉军队最鼎盛时期,有史料可证:建安二十年,孙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15]。虽然此次东征东吴我们不知刘备到底带走军队的数量,但知道东吴方面迎击刘备的兵力数量。《三国志·陆逊传》:“黄武元年,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

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东吴出兵人数达到五万，按照古代战争一般原则，双方兵力应该大致相当。结合前引史料我们推断刘备东征军队人数也应在五万左右。经过陆逊一把大火之后，刘备逃到白帝城，所统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16]《三国志·吴主传》载：陆逊率兵“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而《三国志·刘晔传》裴注引《傅子》云：“权将陆议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从实际情况分析，裴注引《傅子》所载蜀汉兵被杀八万的数字显然夸张，不过五万人损失殆尽则完全是可能的。还可以肯定的是被火攻难逃厄运都是蜀汉精锐之师，此役可谓蜀汉自建立政权来最为惨痛的一次失败。诸葛亮得知猇亭之败绩后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17]此处诸葛亮用了“倾危”一词，可见后果之危险，对蜀汉的打击有多严重。这时发生在南中地区大姓豪族和守土官员内乱，诸葛亮已经无兵可用，他所能采取的态度不是刺激叛军，只能隐忍不发静观其变，甚至是不得不迁就叛军无使其扩大影响。

《三国志·先主传》载，刘璋投降后，“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刘备称帝时以诸葛亮为丞相，表面看来诸葛亮的个人权利似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实情并非如此，当初正是法正“阴献策于先主”，刘备才抓住机会西进益州并接着夺取益州。法正是刘备取蜀的大功臣，是以刘备称帝，“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18]虽然诸葛亮是丞相，但是法正的实权在一定程度上直逼丞相，以至于他敢凭借手中的权力骄横无比擅杀他人。群臣迫于法正的权威不敢直言只能到诸葛亮那里去告状，而诸葛亮的表态极其耐人寻味。陈寿《三国志》中记载了他对此无奈回答及相关原因，“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

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孙权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亮又知先主雅爱信正，故言如此。”^[19]当刘备夷陵失败，诸葛亮的感叹同样令人深思：“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20]诸葛亮的这番叹息从侧面表明了刘备和法正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诸葛亮处在他们二人之间的尴尬境地，可以说刘备在世时诸葛亮确有难言之隐。换个角度说，刘备入蜀后对法正的倚重超过诸葛亮。比如夺取汉中之役，是法正首先向刘备分析汉中的重要地理位置和夺取汉中的可能性，并随行参与攻取汉中。是以“先主时，惟法正见谥”^[21]，刘备在世丞相诸葛亮也只能“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这种情况直到后主当政才彻底改变。诸葛亮与法正二人虽然爱好、崇尚不同，但他总是从大局出发与众人和谐相处。当然，对于法正在军事上的奇谋妙算，也常常得到诸葛亮的赞赏和认可。鉴于刘备对法正往往偏爱有加，所以在对待法正问题上诸葛亮非常谨慎、小心，此中的无奈就不难理解了。

法正、刘备先后去世后主当政之后，丞相诸葛亮的处境大为改观，权限得到极大提升。“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22]从这时起，诸葛亮才有了自己独立办事机构丞相府，他的治国才干得以充分发挥。史载：“亮乃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究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乎封域之内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劝诫明也。”^[23]接着诸葛亮选拔了一批才能突出的官员增强其执政力量，“辟尚书郎蒋琬及广汉李邵、巴西马勋为掾，南阳五梁为功曹，梓潼杜微为主簿，皆州俊彦也。而江夏费祎、南郡董允、郭攸之始为侍郎赞扬日月。”^[24]

虽然诸葛亮此时能顺畅治理朝政，但是蜀汉面临着的形式依然严峻。用内外矛盾交织的困境中

求生存来形容当时的蜀汉政权一点不为过。内部，后方南中大姓豪强雍阆不仅流放朝廷大臣还与东吴勾结并接受遥封；外部，北面魏国趁机要挟，史载“是岁，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各有书与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25]面对曹魏的咄咄逼人，东吴集团的居心叵测，诸葛亮虽有精力但没有力量来组织队伍南征平叛，只能凭借个人智慧对内对外分别采取两手来应对危机。对内，忍痛杀掉益州从事常房诸子，流放其兄弟于越巂。很早的时候常房闻知了牂牁太守朱褒有反叛的迹象，为防患于未然，将其主簿收监杀掉。结果激怒了朱褒，后者反诬常房欲谋反，出兵攻杀了常房。对此诸葛亮不经调查，反而站在朱褒一边，历史文献记载：（诸葛亮）“诛房诸子，徙其四弟于越巂，欲以安之。”^[26]这是为了平息南中地区的社会矛盾，诸葛亮不得已而为之的安抚手段。对外，为避免遭受北面曹魏和东面孙权两面攻击，诸葛亮主动与东吴捐弃前嫌，

“遣尚书郎邓芝固好于吴，吴王孙权与蜀和亲使聘，是岁通好。”^[27]致力于两国关系恢复与东吴和好，从来就是诸葛亮的主张。早在隆中与刘备见面就提出的战略策划，只因刘备盛怒东征使得两国交恶兵戎相见，所以再次与东吴和好是当务之急。

稳定了外面局势，对内诸葛亮一方面开府治事施展政治才能，提拔官员，另一方面采取更积极恢复经济的政策，“（建兴）二年春，务农殖谷，闭关息民。”^[28]也即是说，诸葛亮在南征之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朝政稳定、官员努力向上、经济得以保障。达到了“终乎封域之内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29]的治理国家理想状态。经过了两年多的努力，蜀汉各方面恢复了元气，诸葛亮择机南征，建兴三年春季出兵到秋季仅半年多时间内就平定叛乱。平叛时间之短，功效之高，不仅安定后方民族间的矛盾，同时南中地区还成为今后北伐后勤资源的重要补充之地。南征之役是诸葛亮一生中最辉煌功绩之一，获得政治、军事双丰收。

【参考文献】

- [1] 三国志·吴书·士燮传[M].
- [2] 三国志·蜀书·李恢传[M].
- [3] 三国志·蜀书·吕凯传[M].
- [4] [5] 史记·西南夷传[M].
- [6] 后汉书·南蛮传·序[M].
- [7] 三国志·蜀书·张裔传[M].
- [8] 三国志·蜀书·刘璋传[M].
- [9] 华阳国志·南中志[M].
- [10]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南中志[M].
- [11] 刘琳·华阳国志校·南中志[M].
- [12] [29]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M].
- [13] [15]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M].
- [14] 三国志·蜀书·刘璋传[M].
- [16]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M].
- [17] [18] [19] [20] [21] 三国志·蜀书·赵云传[M].
- [22]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M].
- [23] [24] 华阳国志·刘后主志[M].
- [25] 三国志裴注引诸葛亮集[Z].
- [26] 三国志裴注引魏氏春秋[Z].
- [27] [28]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M].

（责任编辑 张 斌）